



香港中文大學
基督教研究中心
The Centre for Christian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第18期
2013年3月

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暨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通訊

基督教研究中心

地址：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樓
電話：39438155 傳真：26037659
電郵：centre-cs@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theology/ccs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地址：香港沙田崇基學院神學樓
電話：27703310 傳真：26037659
電郵：info@cscrc.org 網址：www.cscrc.org
2013年3月第31期

追憶丁光訓主教

汪維藩著¹ 邢福增注



編者按：丁光訓主教（1915-2012）安息後，跟他在金陵協和神學院共事多年的退休教授汪維藩牧師最近撰文，憶述跟丁主教長達半世紀的交往經過，蒙汪牧師同意，首發表於本通訊。為了讓讀者掌握文中提及的人、事背景，邢福增教授特為本文作注解。本文不僅承載丁光訓主教與汪維藩牧師的深刻情誼，也有助我們認識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的珍貴片斷。全文長達一萬二千字，為方便讀者，標題由編者所加。高行棟先生協助校對全文，特此鳴謝。

初識於「金陵」

初識丁光訓主教，是在1952年夏天，吳耀宗²先生在上海主持召開華東區神學教育會議³的時候。由於外資斷絕，各神學院校經濟上十分困難。會議的主題，便是如何集中人力物力，聯合華東區12所院校，開辦一個具相當實力和規模的神學院。⁴作為杭州（原內地會）神學院⁵學生會主席⁶，我隨院方代表韓彼得⁷牧師參加了會議。會上，我認識了華東宗教事務處羅竹風⁸處長，以及

吳耀宗先生、丁光訓主教（當時尚未祝聖）⁹、丁玉璋牧師、誠質怡牧師等前輩。¹⁰

由於歷史原因，各院校在神學觀和聖經觀上，有「現代派」與「基要派」之分，¹¹且現代派佔某種優勢。為防止信仰受影響，部分代表建議合併成兩個神學院——現代派的，聯合到南京金陵神學院；基要派的，聯合到無錫華北神學院¹²，我是這一建議的支持者之一。會上，兩種意見相持不下。從政策高度解決這一問題的，

是羅竹風處長。他語重心長地說：「在反帝愛國的前提下，任何神學思想都有存在的自由，政府將不加過問，中國各派神學思想是不能定於一尊的。換句話說，宗教信仰既然自由，我們的神學思想當然也是自由的。」¹³金陵協和神學院（以下簡稱「金陵」）的互相尊重原則，便是由這一思路而來。辦學方針或原則共四條。¹⁴據我所知，這四條都是出自丁主教的手筆。而且實際上，1952年11月2日開學典禮後，教務處已經嚴格規定：來自基要派院校的學生，只能選基要派老師的課；來自現代派院校的學生，只能選現代派老師的課。正是在這一「互相尊重」原則指引下，「金陵」走過了五年（1952-1957）安定、團結的路。¹⁵

在「金陵」讀書三年間，常有機會和丁主教談神學問題，特別是當代中國的神學問題。例如，丁對當時很流行的「神學觀點有階級性」的提法，非常反感。他問：三位一體有甚麼階級性？又如，外賓參觀某一沒有浸池的教堂時，會問：你們為甚麼不施行浸禮？我們的人往往會回答：我們沒有浸池，沒有這樣的設備。丁說：這是不懂神學的一種最粗淺的回答。再如，上世紀50年代，講臺上常把新社會和天國、和新天地混為一談。我自己就曾寫過一篇〈天國的福音〉¹⁶，既不像講道查經，又不像政治學習心得。丁主教在文後批了幾個字：要注意「過渡」。這使我懂得：不宜直接用政治詮釋聖經，也不宜直接用聖經詮釋政治。

大概是1953年上半年的某個晚上，在行政樓下會議室裡，丁主教讓我向三位老師談談福音派（即屬靈派）。除丁主教外，還有陳澤民和徐如雷兩位老師¹⁷。我介紹了賈玉銘、楊紹唐、倪柝聲和王明道，以及他們之間的異同。當丁主教和兩位老師和我握手道謝時，我不禁受寵若驚。因為，我當時只是個本科二年級下學期的學生。

三年級時，我用一個練習本編了一卷「希臘文—英文—中文逐字對照的《腓立比書》」（Chinese-Greek-English Interlinear Philippians）。四年級時，又寫了一份題為「中世紀神秘主義」的論文，交給教基督教思想史的陳澤民老師。陳老師給了16個字很好的評語，具體內容

我忘了。50年代的「金陵」，是不要求畢業班寫論文的。但論文的主旨卻影響了我一生——神秘主義或奧秘主義，是可以而且應當同治學、同修身、同服務等等，聯繫在一起並互為表裡的。我又請丁主教指正。他閱後未加評論，只問我，是老師給的作業還是自己主動寫的。我說，是自己寫的。

《聖光》命運

畢業前不久，在丁主教辦公室，丁主教說他希望我能留校。放假後，我高興地去了上海，同妻子住在林聲本¹⁸同學家，等待丁主教的信。一直等到9月中下旬，丁主教的信來了。我至今仍記得他信上的一句話：「留校的事有困難。出爾反爾，希見諒」。又說，鎮江有個小教會需要傳道人，但出不起工資，每月由神學院支付25元，問我願不願去。我二話沒說，從上海趕回南京，去了鎮江潤中浸會堂，每月回南京領25元，並先奉獻「什一捐」2元5角。

1956年末，丁主教建議「南京三自」出一份靈修刊物，以落實1954年第二次全國會議上的決議之一¹⁹。刊物請賈玉銘牧師為之起名為《聖光》，暫定為雙月刊。編輯人員，除李晨鐘²⁰牧師外，丁主教又通過「南京三自」，將我從鎮江調回來。1957年的訂戶約5000多，這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字。

公餘之暇，我不時到丁主教家談些神學問題。有一次竟談到深夜12點多，話題是「新耶路撒冷」——中國教會的未來。

但好景不長，1958年初夏開始，江蘇省宗教界開展反右運動。《聖光》雙月刊只出到第7期便告夭折²¹，我則被錯劃為「右派」，離開教會，一別就是整整20個春秋。

文革後宗教研究的初春

1979年初，丁主教和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²²，研究決定在神學院院址成立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這可能是當時國內各大學的第一個宗教研究所，工作專案有重譯聖經、翻譯《基督教思想史》（〔美〕胡斯都·L·岡察雷斯²³）、出版一本叫《宗教》²⁴的刊物，等等。

「四人幫」被粉碎，南京和全國一樣，群眾上街遊行慶祝。我在隊伍中觀禮臺上，看到了丁主教高大的身影。回家後，給他寫了封長信。丁主教回信讓我到他家；至於改正「右派」錯劃問題，叫我不要提出，由他出面解決。去主教家前，我寫了一幅字送給他，上款是「光訓恩師」。他笑著說：「帽子太大了」。

不久後，南京市統戰部給我所在的南京鋼窗廠發了改正錯劃的公函。又不久，丁主教請韓文藻²⁵先生，以南京市政協的名義辦手續，將我調至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至此，我心深處，重又樹起了做人最起碼的尊嚴。

1976年，中國宗教學會在雲南開會成立。會長任繼愈²⁶提出學會的使命，是要「研究宗教，批判神學」；「上掛林彪，下批宗教」；「揭露宗教永不改變的鴉片麻醉本質」等等。這就激起了與會的趙樸初²⁷、羅竹風、丁光訓等學者的不滿和反

對。「社會主義時期，宗教是不是鴉片？」一場論爭開始打響，並被圈內人戲稱為「第三次鴉片戰爭」，因為歷史上「鴉片戰爭」只有兩次。可能經過商定，丁主教在南京主辦一個叫《宗教》的理論性刊物，稿源來自南大宗研所和上海宗教所²⁸的研究人員，不管是信徒或非信徒，只要本著「實事求是」原則探討宗教問題，便可在這平臺上參與爭鳴。趙樸初先生在北京「中國佛教協會」建立了一個綜合研究所，出版了《研究動態》²⁹季刊，及時報導有關宗教研究和爭鳴的動態。上海社科院宗教所，則在羅竹風先生領導下，強攻兩個課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宗教為甚麼還能存在？宗教到底起甚麼作用？³⁰

僅兩年間，北京、上海、南京便彙集了由部分黨政幹部、學者、宗教界人士所形成的「三支隊伍」。

文字事工的合作

《宗教》，原來由許鼎新³¹先生編輯，從1979年創刊號編起，後丁主教讓我接手。除編輯、寫稿之外，讓我每期寫點編後。丁主教和我合作寫的文章，僅兩篇。其一為譯作：威廉·弗萊徹的〈宗教和蘇聯外交政策〉。³²這篇長文基本上是丁主教翻的，他因出國，讓我全部校譯一



遍，並在太長的全文中加上小標題，便於讀者閱讀。發稿時，丁主教將我的名字放在前面，他自己用「朱波明」的筆名，且放在我的名字之後。對名聲名望，丁竟淡泊如此。其實，對生活要求，丁同樣淡泊如此。外人很難相信，丁主教的書房竟不到10個平方，一件邊上帶縫子的舊棉襖，穿了若干年。

我和丁主教合作的另一篇文章，是〈近幾年宗教研究上若干突破〉。這是中央統戰部第二次「中國統戰理論研討會」約寫的論文。當時，丁主教生病住院，要我代筆。我用三天時間，翻閱了三百多本專著的序或前言，因為作者的主旨，都在序或前言裡面。又用三天時間，寫成了一篇一萬多字的文章。送到醫院給丁主教審閱時，他正躺在床上。文章看了一兩遍後，便斜躺著用筆在文稿上改動了幾個字，就這樣，文章在1989年6月發表了。³³

再就是，他為我的《中國神學及其文化淵源》寫過一篇序，並把這篇序收在他的文集裡。³⁴此外，他在另一篇文章裡（〈中國基督徒怎樣看待聖經〉），引用了我的一段默想。³⁵

甚而可以說，為《丁光訓文集》³⁶的出版，他都曾力爭我的合作。他問過我，要在外面出一本書，需要做哪些準備工作。我告訴他，要找一個編輯，再找個列印文稿的人。編輯，他找的是我推薦的田童心³⁷同工。打字，韓文藻先生為他提供了「寧辦」（基督教全國兩會南京辦事處）³⁸的矯捷³⁹。每打好三、五篇，丁主教便叫勤務員小周送到我家，讓我看看哪一篇不宜發表，哪一篇裡面的哪一段、哪一句不宜發表。考慮到要花我的時間，他讓小周幫我跑腿辦事。但我那年夏天，活動特別多，工作特別忙，預約好要到吉林省吉林市、四川成都和重慶市領會講道。文稿全部打完並全部送來時，我已準備動身了。除一兩篇作了仔細修改外，我只得將300多頁、幾斤重的書稿，從南京帶到吉林，從吉林帶到成都、重慶，再沿江而下帶回南京。半個多月當中，我實在抽不出時間看幾篇文章。回來後，我抱歉地如實告訴丁主教，並打算繼續看下去。但丁主教說：「不看了吧，你年紀也不小了。」當年是1997，我70，丁主教高齡82。至今，那300多頁書稿，仍珍藏在

我書櫥裡，先後十五個年頭。

聖經重譯

至若聖經（新約）重譯工作，我1979回來時，幾位老師已在通讀、通譯路加福音了。主持工作的，是山東請來的王神蔭⁴⁰主教，和本所的陳澤民老師。陳澤民老師讓我參加路加福音小組，同時重譯保羅書信。丁主教講過：「我們的譯文，要像《人民日報》那樣的文字，又要忠於原文。」我記得有一次，為譯好「反覆思想」（路1：29），大家參考了不同版本的英譯，最後一致認為，ponder的意思比consider更接近原文詞義，莫如喜⁴¹同工還把ponder朗讀過幾次。我的保羅書信，用了不太長時間也翻好了，等待通讀、通譯。但在1979年秋冬之際，國家宗教局落實政策，希望神學院儘快復校。這樣，聖經重譯工作不得不停頓，把大部分人力轉移到教學準備上來。那些沒有完工的譯稿，後來也找不到了。

「金陵」復校後的90年代末，還有過一次意譯聖經新約的籌備會議。丁主教主持，參加會議的有譯林出版社的一位編輯、北京的楊慧林⁴²、南京「金陵」的莫如喜、汪維藩、張賢勇⁴³等。會上決定：每人試譯兩段較短的經文，「愛的讚歌」（林前13章）大家都譯，各人再自選一段。後來，譯稿都交來了，卻又沒有下文。這些譯稿放在我的文字室裡若干年，退休後，我將10多頁稿件，交給了一位教中國教會史的同工。

丁主教兩次發起翻譯聖經，但都沒有結果。過多的事工壓在丁主教和他同工們的肩頭，很熟悉的人可能都會知道，丁主教有「兩少」——吃得少，睡得更少。

《函授》教材

政策落實後，信徒最最急需的是聖經。但聖經又不是一下子就能印出來的，丁主教決定辦一份像50年代《聖光》那樣的刊物，把經文、查經、講章等等先送到同工和信徒手裡。但當時一個教只能辦一個刊物，有了《天風》就不能再辦別的。丁主教便給它起名叫《函授教材》，說這是神學院函授科發的「教材」，而不是出版的又一個「刊物」。韓彼得牧師任函授科主任，我是

副主任。第一期《函授教材》是1980年下半年出版的，比1981年神學院開學早了半年。而函授科本身的成立，則到四年之後，孔祥錦⁴⁴同工借來之後，半工半讀學生可以協助工作之後。為滿足信徒和教會的需要，丁主教竟是如此別出心裁。

為函授科的成立，丁主教還生了沈以藩⁴⁵同工一場氣。為金陵函授科的設立，丁主教讓院辦公室打了一份報告，寄到北京，請國務院宗教局批准，文稿是丁主教讓我起的，手續則是辦公室辦的。國宗方面認為這是件擴大神學教育的好事，很快便批了下來。不意，全國兩會的沈以藩同工給丁主教來了一封信，認為金陵直接打報告給「國宗」（國務院宗教局，下簡稱「國宗」）不妥，應當先打報告給「兩會」，由「兩會」向「國宗」報批。這一下把丁主教氣壞了。至少有三次，他坐在神學院接待室的沙發上唉聲歎氣。我半跪在沙發旁邊，像是為比我還小一歲的以藩求情：「他還小，還年輕，不要計較他吧。」丁主教說：「如果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他會打倒我的！」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丁主教發那麼大火，而且持續時間很長。我似乎懂了一點，對一位威望如此之高的老人，一旦觸動了他的自尊與尊嚴，他將是十分痛苦，難以忍受的。但我似乎又並未完全明白，在若干年後，我又蹈了以藩的覆轍，而且惹起丁主教的怒氣更大。

呼喊派

約在1983至84年前後，全國範圍內打擊「呼喊派」⁴⁶。此時，既要幫助信徒辨明真道，又不能根據表面的大聲禱告就判定為呼喊派。唐守臨和任鐘祥⁴⁷兩位弟兄，合寫了一篇文章，⁴⁸以聖經為依據，既揭露了呼喊派的異端本質，又把只是表面大聲禱告的信徒和呼喊派區別開來，從而挽救了一些人，拯救了一些人，又保護了一些人。

呼喊派的大喊大叫，出於對聖經上「求告」（羅馬書10:12-13）一節的誤解。「求告」的聖經希臘文，意為「呼求」，而不是喊叫。把對上帝的求告與呼求誤解為大喊大叫，但又不能把祈禱時大聲喊叫的人都看為呼喊派，還要看他是否承認主名，承認耶穌是天父生的。我建議丁主



教將這一篇保護真道，識別異端的文章，印發出來附在《教材》後面。不意，反應強烈，來信要求贈閱的人很多。經丁主教同意，我到江蘇軍區印刷廠跑了三趟，先後印了二十多萬份，免費寄給寫信來要的人。我們本著宣揚真道的心，既打贏了一場戰役，而挽救了一批單純的弟兄姊妹。

1984年春天，浙江省蔡文浩⁴⁹牧師召開了一次春令會，這是文革後的第一次全省同工培靈會。請了蔣佩芬⁵⁰老師領每天的早禱，我領培靈會。我的講題是「從天上來的異象」，和她的講題竟然相同。會議期間，傳來了義烏有位呼喊派青年被判死刑的消息⁵¹。當時的陣營很複雜，呼喊派有二百人在監獄外靜坐要求代死，村裡的農民則團團圍住監獄，說這個孩子是我們看著他長大的，各方面都很好，不當判死刑。此外，呼喊派在造謠說：「『三自』借刀殺人」。我對丁主教說：「此時，三自必須救人一命」。丁同意了這個建議，並由我擬了一個報告，由蔡文浩牧師寫給丁主教，丁主教在會上表態，一定要救這個



青年。結果，從死刑——死緩——無期，連降三級，而在服刑期間由於表現很好，被關了20年就出來了。這位弟兄放出來後，曾到南京看望丁主教，也看望了我。

另有一例，是甘肅天水的數學老師荊長老，「反右」時被送到夾邊溝⁵²，三年自然災害期間⁵³，那裡曾經餓死成千個「右派」。荊長老大難不死，本想報效祖國，未想到打擊呼喊派又找上了他。天水有個叫周寶珍的學生在「金陵」83級讀書，她得到消息趕快告訴了我，我則儘快轉告丁主教。結果，荊長老的問題很快就解決了。前幾年我去甘肅平涼參加他們的獻堂典禮，碰到了荊長老，提到這件事。我們同吃了一頓便飯，把榮耀歸給上帝。

宗教幹部與宗教政策

一談起幹部對宗教、教堂的管理，丁主教總是不愉快，不高興，這可能和他西方的生活、學習、工作有關，有種天然的難以接受的心態。有一次，他帶李亞丁⁵⁴、張賢勇兩個研究生去溫州調查研究。當地宗教局長在一份名單裡，把他自己也放在丁主教的隨行人員裡面。丁毫不客氣地問他，你是當地的宗教局長，你什麼時候變成了我的隨員了？搞得那幹部很狼狽，下不了臺。那幹部還為丁主教安排了時間表，但丁主教根本不理

那一套，下午帶著李亞丁、張賢勇看當地教牧同工去了，不管局長安排的行程。

在出國訪問的問題上有過規定，宗教黨政幹部不得和宗教界人士混合編團；宗教界人士的講章和發言稿，黨政幹部也不得審查。有一次到德國訪問，一位宗教幹部參加編團，並儼然成了代表團的團長。特別是包佳源⁵⁵同工發言前，他竟把發言稿要去看，給德國與會信徒造成很壞的印象。丁主教和趙樸初先生便把這類事，一股腦兒反映給中央。不久，這位幹部下了台。

宗教管理部門曾試行「登記證」，⁵⁶廣州市東山曾進行試點，寫出了一份總結。丁主教給我看了一總結，我當即寫了一篇批評文章，一是批判對待宗教「綜合治理」的提法。一般對公害「綜合治理」，用綜合治理的辦法管宗教，必然是眉毛鬍子一把抓。關於辦登記證的問題，我說，南京收到廣州信徒來信，說花400元就可以買一張登記證，沒有什麼稀奇。

這時，正值廣州東山堂請我領培靈會，我在會上對這些問題開了幾炮。有一天，梁福寰⁵⁷牧師還說：「今天又開炮了吧！」

培靈會結束後，幾位負責人請我吃晚飯，有梁福寰、黃廣堯⁵⁸等幾位牧師，東山區一位宗教幹部也來了。我和他辯論得不可開交，我說：「人家花400元就可以買一個證了，有什麼稀罕。」他說：「我們成本費只收五元錢嘛。」我說：「你們這樣搞，國務院宗教局說他們不知道。」那幹部急了，委屈地說：「就是他叫我們試點的嘛！」一時間，大家啼笑皆非，拿起筷子，悶著頭吃廣東菜，一聲不吭。

宗教管理問題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正在探討的一個問題。現在不但要民政部門登記，還要宗教局登記⁵⁹，還要當地「三自」和「協會」這些「二政府」同意。這種情況隨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必能解決。但丁主教把問題提得早了些，在田林賓館的會議上⁶⁰，他提出理順關係問題：要理順三自和教堂的關係，要理順宗教事務部門和教會的關係（參〈理順三自組織和教會的關係〉，1988年12月13日）。⁶¹眼下進行的改革，正是丁主教所預見的方向，但當時，卻被個別同工斥之為「田林復辟」，一頂可怕的帽子扣在丁主教頭上。

福音派

1984年，丁主教決定《神學誌》復刊。⁶²復刊第2期（1985）組稿時，丁主教讓我寫一篇〈中國福音派的某些神學變遷〉，但在付印時，丁主教幾經斟酌，還是用了〈中國教會的某些神學變遷〉。⁶³當時他說，中國現代派沒有什麼神學，無非是「上帝是天父，大家是弟兄姊妹」。

「文革」後，丁主教幾次引用蔡文浩牧師的話：「中國教會的主流是福音派」。這一對中國教會實際情況的估計，指導了丁主教若干年的事工，包括神學教育、人事安排、事工重點等等。但他也勸告過一位同工，「你原來是現代派，就不要去模仿福音派」。這是從另一個側面持守「互相尊重原則」。

雲南省政協的一份文集發表了一篇完全是「文革」遺風的文章，丁主教看了很生氣，並把文章轉給了我。我寫了一篇〈放下你的「鞭子」！〉⁶⁴，準備發表。但對這個題目，我拿捏不准。請示丁主教，他說就用這個題目好。對「文革」遺留下來的「左」的東西，丁主教有種出自生性的反感，對教內如此，對教外也如此。

1995年，丁主教80歲的時候，我寫了一篇〈愛她，我常流淚，念她，我常祈求〉⁶⁵。文末，附錄我為丁主教寫的一首《題照》：

青山猶在憶青絲，雙鬢斑斑似有思。
負鼎剛肩慈母笑，窮天慧目雪融時。

詩寫於1987年，這裡的「鼎」指中國教會的命運。

「金陵」的出版工作

「金陵」的文字出版工作，丁主教讓我們文字工作室負責。《神學誌》、《教材》、《宗教》三個刊物之外，我們出了將近十本叢書，如古典的勞倫斯的《與神同在》、聖法蘭西斯的《靈花》⁶⁶等等。加上許多全國兩會的書。由於全國兩會的《要道問答》⁶⁷是由「金陵」出版的，接下去鄭建業主教編的6本一套義工培訓講義，也是由我們出版的。1988年，沈以藩主教主編的「神學教育叢書」便順理成章的由「金陵」出版。⁶⁸由

於數量多，任務重，工作壓力逐步加大，差錯便難防止，校對品質便難以保證。

1988年，上海一位很愛主也很愛國的歐陽太太，來南京找我們，願意墊付15000元，讓我們出版賈玉銘老牧師的《羅馬新講義》，我請示了丁主教和韓文藻先生，他們都表示同意。沒有想到，1989年5月間樣書出來時，我發現，文中有「政府之腐敗，……當今社會之黑暗」等等。⁶⁹儘管原書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出版的，但拿到今天出版，可能會引起「影射」之嫌。我主動和國家宗教局郭偉同志聯繫，擬對三處作點處理，但不改動作者原意。郭偉同志回信表示同意，並又提了兩點小的改動。我通知印刷廠之後，出來的書全是改動過的書。

1989年一次會議上，江蘇省宗教局長拿著一本未經修改的《羅馬新講義》責問說：「怎麼到現在還說社會之黑暗，政府之腐敗？！」我拿著另一本改動過的書回答說：「請看，改動過了」。當時，院領導決定，把印過的一萬本書封存，暫不出售。沒有想到，等上面發現好幾千本已經賣掉了。上面派人追查，我說很簡單，查找第一本出售的發票。第一本出售的日期是1989年8月3日，此時我正在福州主領培靈會。韓說，不查了！經丁主教、韓文藻先生干預，不了了之。

2000年，沈德溶⁷⁰先生在武漢召開了基督教的出版工作會議。其所以選擇武漢，因為它是中國基督教最早出版書刊的地方。會上，個別同工向南京方面提出批評。一個問題是江浙兩省兩會出版聚會處的《詩歌》。個別上海的同工指出，這本《詩歌》的出版助長了宗派主義。浙江的代表感到有錯，開始檢討。但江蘇的韓彼得牧師則振振有詞，說《詩歌》的出版不但沒有助長宗派情緒，反而加強了對聚會處的團結。上海來的另一位同工則指責我們出了法蘭西斯的《靈花》、坎培·湯瑪斯的《效法基督》⁷¹、勞倫斯的《與神同在》等等，宣傳了一些消極的東西，我反駁說：對這些東西要辨證地看，要看到這些書對人的心靈、品德、善行德行諸方面的積極影響。我們只要不違反「四項基本原則」，就可以出版。一位幹部說：「基督教出版物，單單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我大聲反駁說：「難道還有第五項基本原則？」那次武漢會議沒有形成什麼決議。

應當感謝沈德溶先生，是他掌握了互相尊重原則，沒有讓「左」的東西干擾中國教會的出版工作。

八九年六月的「金陵」

1989年6月5日，神學院的學生聽到一些謠言，當天是星期一，晚上按例有禱告會，正好輪到我主領，我選的是求平安的經文。「耶路撒冷啊，願你城中平安，願你宮內興旺」（詩122）。選的讚美詩是《以馬內利來臨歌》，同樣是求平安（賽8:8）。最後，大家同聲用《主禱文》禱告，簡直像部隊吶喊一樣，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用這樣一種呼求的心向父神禱告。

禱告會後，不知又從哪裡傳來謠言，說解放軍晚上要進駐各大專院校。包括神學院。學生們畢竟是孩子，一下子都慌了，有的跑到親戚家去，有的跑到車站碼頭，準備乘車船回家。當時，我打電話告訴丁主教。丁主教說：「走的不要攔阻，不走的不要動員」。我找了幾個男生，把宿舍樓的大字報全洗刷掉了，又到女生宿舍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安撫說，「別怕，解放軍不會來的。我今晚一夜在樓下大廳裡陪你們。」我真的和一位青年同工在樓下呆了一夜。除了深夜聽到兩聲槍響，一夜平安無事。事後，在一次追查的會上，有一位老師說：「汪維藩選的讚美詩是《新生王》，目的是要打倒××。」又有一位同工說：「汪維藩說過，等解放軍來，他要和解放軍拼命。」為了保護我，丁主教找顧約瑟⁷²同學跟同學們一一核實，全是造謠陷害。丁主教弄清真相後，根本沒有找我談話。

還有，神學院的學生在鼓樓，口號喊多了，口渴了，但又回不來，便叫人回來取開水。當時我管理學生食堂，不但用大水桶送去了開水和一些一次性杯子，還叫工人用車子送去了幾籠饅頭。後來，有人往我身上潑污水，說我支援學生造反。我說：「在這種情況下，有哪一家父母不給孩子送飯的！？」⁷³

唯實研究當代基督教

1990年末，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當代研究室召開了一次有關當代宗教情況的研討會。⁷⁴此時，任繼愈已調去北京圖書館當館

長，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所長是戴康生⁷⁵，當代室主任是彭耀⁷⁶，他們的研究方法是「唯真唯實，不唯書，不唯上。」這一研究路線正好和上海宗教所的「實事求是」路線形成了南北合力，同時帶動了北京的一批青年學者如何光滬、高師寧、張志剛⁷⁷等等。

1990年的會，先讓大家在小組發言，然後由各宗教派一人總結問題在大會上發言。基督教只有沈以藩和我二人。他的身份不宜作這種發言，我則發了一通類似「大鳴大放」的發言，揭露了基層許多總結政策不落實的地方。我的發言引起了一番震動，社科院一位同志說被我征服了，統戰部一位叫李平曄⁷⁸的同志則對我開玩笑說：「你該再打一次『右派』。」會後，這篇發言發表在我們的《宗教》上，題為〈談基督教的現狀問題〉。⁷⁹

不意，香港的《橋》⁸⁰摘錄了文中的一段發表了，引起了國家宗教局一位幹部的注意。等當代室第二年（1991）再去申辦研討會時，那位幹部拿出了那期《橋》說汪維藩在造謠，會不許開。經過當代室三次申請，這才同意舉辦。但要由統戰部、宗教局派人組成小組，每晚評估一天的發言，若有「錯誤言論」便組織反擊批判，特別要注意汪維藩。丁主教知道情況後，便和統戰部有關同志商量，讓張聲作⁸¹副部長請我赴宴，在飯桌上將我們的觀點看法講清楚。臨行前，丁主教對我說：「你若不去，你就不是汪維藩；去了若不說話，也就不是汪維藩！」到了北京的當晚，我從趙家樓穿過天安門廣場，來到府右街中央統戰部。李平曄早在門口等我，用手比畫成一支手槍，說：「瞄準你了！」

到統戰部食堂之後，張聲作部長和葉小文⁸²同志正在等我。張部長和我談了半小時之後，突然大聲說：「你也不贊成盲目發展教徒啊。」我說：「我什麼時候主張盲目發展啊？！我們現在只有600個牧師，信徒卻有六百萬，一個牧師要帶一萬信徒。我們哪裡有這樣本領的牧師啊。」飯後，我們到另外一個房間喝茶。我說：「謝謝部長召見。」張部長說：「交個朋友嘛。」我說：「我這個人有個毛病，有意見就得講。因為毛主席說過，執政黨就怕鴉雀無聲。」張部長大聲說：「是啊，於無聲處有驚雷嘛。」相談甚歡之

後，他們派統戰部的小車把我送回住處。

第二天就開始了社科院三天研討會（1991年12月底）。緊接著是基督教第五次全國會議⁸³。社科院從外地請去參加研討會的僅二人，一位是羅竹風先生，這是能夠壓住陣腳的一尊大佛；另一個是我。第二天上午第一個發言的是公安部的代表，先放了基督教搞滲透、搞偷運聖經的錄像短片。第一個短片是在廣州抓住幾個街頭上的「上帝之子」⁸⁴（Children of God），第二個短片是一兩個婦女從內褲裡掏出幾本偷運的聖經。特別是第二個短片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學者的反映非同一般教徒。對第一個短片，他們說，Children of God 在美國不也是定為異端嘛！對第二個短片，學者們說：「聖經是本好書，讓它進來不就完了嗎，何必逼得人家裝在內褲裡呢？」短片放過後，公安部的那位同志先讀了一篇發言稿，並事先聲明這是公安部領導看過通過的。讀過後說：現在我談談個人的看法。首先，要有一部宗教法。今天叫我們抓人，明天又叫我們放人，這不好辦，不若依法辦事。其二，宗教界本身要固本，搞好自己的事。羅老最後的發言肯定了這兩點是綱領性的。

接在公安部的代表之後是我發言。當時，江澤民同志剛剛在黨的七十周年慶典上提出了如何處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政治、新經濟、新文化問題。⁸⁵這使我想起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早就提出過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新政治、新經濟、新文化問題。⁸⁶時隔50年（1940-1991），卻有一條紅線貫穿著中國歷史的兩個階段。我又想起，毛澤東在「新文化」一點中提出的策略問題，便聯繫到今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當有的對宗教的策略。我說：「作為中國文化之一部分的中國宗教，無法擺脫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這種領導，首先應該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宗教觀的領導，不能用教條化的立場和方法作為宗教工作的方針。」⁸⁷

晚宴後我和羅老道別，他去北京老朋友家，我離開趙家樓到豐台賓館向全國會議報到處報到。但沒有想到，報到後，丁主教找我。說你不忙參加會議，這裡有些問題你先書面回答，由我寄給沙廣義⁸⁸，江蘇省宗教局也就清楚了。題目是丁主教寫的，問題是江蘇省一個宗教幹部反映

的。例如，「汪煽動學生罷吃（不在學校食堂吃飯）」、「汪出版有反動內容的書」（指賈玉銘的《羅馬新講義》）、「汪支持學生上街」等等不實之詞。我一一作了回答。

回南京後，省宗教局沙廣義處長登門致歉，並勸我不要和某人計較，我當然不屑和這種人計較。不久後，省宗換了一位年輕的李科長來聯絡，開會只聽，不多言語。

按三自原則辦好教會

為準備1996年要召開的第六屆全國會議，⁸⁹兩會組織了一個工作報告的起草小組，上海有羅冠宗、曹聖潔⁹⁰等人，南京則有由丁主教提名的我。丁主教說得很對，在「按三自原則辦好教會」這9個字當中，上海側重「按三自原則」，南京則側重「辦好教會」。韓文藻先生則突出一個「辦」字，主張多做實事。

1995年夏，我跟丁主教和韓先生去上海，我主要是參加工作報告小組，且在提不提「按三自原則」問題上繼續我的主張。丁、韓則出席主席會長會議，研究有關問題。去上海時，一節車廂裡只坐了丁、韓、汪三個人再加一個保衛人員。到上海下車也不是在月臺上，而是開到一個有汽車等著的路口。開車後直奔一個法國式的賓館。孫錫培⁹¹從杭州也來了，和我住一間。丁、韓每人一個套間。那是一次動員孫錫培接任兩會會長的協商，孫堅決不幹，結果臨時決定由韓文藻當會長，將鄧福村⁹²安排為秘書長。蘇德慈⁹³請辭總幹事，一心一意把華東神學院辦好。羅冠宗任主席，總幹事由曹聖潔擔任，韓文藻任會長。

在回來的車上，我和丁主教談起建設教會的原則問題。丁說：「辦好教會的原則很多，『三自』不過是其中之一。」我說：「獨立自主原則可以涵蓋『三自』原則。」丁說，還有聖經原則，信仰原則，民主原則等等。

回南京之後，我寫了一篇〈論中國基督教自我建設的口號——兼評按三自原則辦好教會〉，文章送丁主教過目，想在《宗教》上發表，但副主編不同意，我便根據丁主教的指點修改，並且一口氣改了14稿，精神幾乎崩潰了。丁主教建議，既然不能在《宗教》上發表，不若印100份發給兩會的常委作為供思考的一家之言。但就在這

時候，葉小文局長在青島講話還是用「按三自原則辦好教會」。韓先生趕快打電話給神學院發行科，結果一份沒有寄出去。《宗教》上當然也沒有發表。

在這一長達14次的修改過程中，丁每次都看，且在有一次還指出我的觀點怎麼退了一步。但我又發現，丁主教對上海和南京的爭論不是太感興趣，而是在考慮另外什麼問題。1995年夏天，上海寄來了一份工作報告草稿，丁主教、韓先生給我看。我發現還是強調「按三自原則」。我用兩天時間起草了另一份工作報告，強調辦好教會。丁看了後說，這一下將了上海一軍。頗有遊戲口吻。兩份報告草稿由韓文藻先生綜合成一份：既強調「按三自原則」，又強調「辦好教會」。這就是1996年第6屆全國兩會在大會上由韓先生作的工作報告⁹⁴，但在《三自文選》（第二卷）上，卻沒有報告者的名字。⁹⁵那一年丁主教從領導崗位退了下來，由羅冠宗先生擔任主席，韓文藻先生擔任會長。丁主教則組成了一個「神學思想建設小組」，丁任組長，由三位同工擔任副組長。⁹⁶結果，發表了一些不利於丁主教的文章，⁹⁷做了一些不利於丁主教威望的事，令我頗為惋惜。

親情

1997年，由於精神壓力太大，我去南京腦科醫院療養。第二天，丁主教就趕去醫院委託大夫悉心醫治，說汪的工作在神學院很重要。這已經是多年當中的第二次了，第一次是用他的汽車把我送到人民醫院看醫生，像是親人一樣。1996年夏，我情緒很亢奮，丁主教特地打電話給我上海的大女兒，讓她回南京看我。等我情緒平靜之後，還參加了年底的全國會議，並作了一次大會發言。我反對那種「以信與不信為軸心」的神學，但在解決這一問題時，要尊重聖經的權威、信仰的尊嚴乃至信徒的感情。

1998年前後，丁主教在表達時曾有一點不夠慎重的地方，以致和我之間出現了一些分歧。⁹⁸丁主教在《人民政協報》上發表了一篇〈調整宗教觀念的召喚〉；⁹⁹我則在《世界宗教研究》上發表了〈慎言宗教改革〉，又在《研究動態》上發表了〈宗教觀念之改革，馬恩如何說？〉。¹⁰⁰

丁主教問一位同工說：「聽說汪在整理我的材料，要批判我。別那麼劍拔弩張嘛。」我則對那位同工說：「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這些話傳到丁主教耳朵裡，必然會引起如沈以藩主教曾經引起的那種反應。

但我無法相信，丁主教和我50多年積累起來的師生之情、忘年之交，竟能被毀於不足一年之中。我曾讓他歡喜、讓他高興，也曾惹他生氣。但我不能不說，丁主教是中國教會的一位偉人。在丁主教沉默地走後，我不能不追思中國教會的這位偉人。

1999年我從金陵退休之後，在2006年夏天丁曾邀我去他住處一次。見面時，丁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我之間的是是非非，就讓它過去罷。」我說：「當然讓它過去。」丁坐在沙發上，讓我和妻子一人各拉著他一只手，坐著的他又站立起來了，儘管不是太穩。我們又合了影，並在一起吃了晚飯。

這使我想起1954年我和妻子在上海丁主教家結婚的那餐中飯。這是丁主教第一次為人證婚。妻子的兩個辮子是丁師母給梳的，喜糖是丁院長叫人買的。如今，丁主教正在遠去，往事層層，我不能不追憶我的恩師丁主教——一位中國教會的偉人！

1 汪維藩（1927-），江蘇泰州人。1947年受洗。1948年入讀南京中央大學教育系，期間參加「全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後離校入讀杭州中國神學院。1955年自金陵協和神學院畢業後，在江蘇鎮江浸會任職傳道。1957年在南京協助《聖光》編輯工作。1958年被劃「右派」，在南京棲霞山接受了三年勞改。1961年至1966年在南京33中學任英語教師。1966年，受文革沖擊。1971年至1979年在南京鋼窗廠勞動，擔任過工人、生產科調度、鋼窗技術員、生產科長等職務。1979年調回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1980年金陵協和神學院復校後，回校任教，1999年退休。著作甚豐。主要著作收入宗文社出版的《廿載蒼茫》及《十年蹣跚》。

2 吳耀宗（1893-1979），中國基督教三自運動發起人。參邢福增：《吳耀宗的生平、思想與時代》，吳耀宗著，邢福增編注：《黑暗與光明》（新北市：橄欖華宣，2012），頁xii至lix。

3 新中國成立後，神學教育因學生來源及經費問題，面對極大挑戰。1952年8月，華東地區基督教界在上海召開神學教育座談會，決定成立華東聯合神學院籌備委員會。

4 十二所院校：南京金陵神學院、南京金陵女子神學院、上

- 海聖公會中央神學院、上海中華浸會神學院、杭州中國神學院、無錫華北神學院、濟南齊魯神學院、漳州閩南神學院、福州福建協和神學院、寧波三一神學院、鎮江浸會聖經學院、濟南明道聖經學院。
- 5 全名為「中國神學院」，由內地會於1948年在杭州創立。
 - 6 汪以學生會主席名義，撰寫了〈革新後的中國神學院〉，見《天風》，期299（1952年1月26日），頁12。後來他又撰〈我們的寒假生活〉，上及下，見《天風》，期303（1952年3月1日），頁6至7；期304（1952年3月8日），頁6至7。
 - 7 韓彼得（1919-2010），時為中國神學院代理教務長。
 - 8 羅竹風（1911-1996），中共黨員，1951至54年間任華東宗教事務處處長，1954年任上海宗教事務處處長，是主管基督教及天主教工作的重要幹部。文革期間受批判，1978年平反後，先後任《漢語大詞典》主編及《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兼宗教卷主編。1979年當選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主編《中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一書。
 - 9 丁光訓於1955年被中華聖公會祝聖為浙江教區主教。
 - 10 丁玉璋（1895-1975），畢業於山東華北神學院。後任中國基督教長老會魯南大會會長及總書記，又任華北神學院副院長。1950年起任華北神學院院長。1952年任金陵協和神學院副院長，是院內「基要派」的代表人物。
誠質怡（1898-1977），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後於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教授新約。1935年起任教金陵協和神學院，1950年起任院長。1952年，金陵協和神學院成立，出任副院長，是院內「現代派」的代表人物。
 - 11 聯合組成金陵協和神學院的十多所院校，分屬「基要派」（中華浸會神學院、中國神學院、華北神學院、浸會聖經學院、明道聖經學院）及「現代派」神學傳統。「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及「現代主義」（Modernism）的神學論爭是二十世紀基督教歷史的重要課題，這種神學對立問題也在中國教會出現，形成壁壘分明的對峙局面。
 - 12 金陵神學院於1907年由美南及美北長老會創辦，後美以美會、監理會及基督會加入，是二十世紀前期神學立場較開放的神學院校，出版《神學誌》。
華北神學院，1919年由美北長老會傳教士赫士（Watson Hayes）因不滿齊魯大學神學院的現代主義神學傾向而在山東創立，是二十世紀前期中國基要派極具影響的神學院之一，丁立美、賈玉銘、張學恭等先後在院內任教。1941年因太平洋戰爭而停辦，1946年在江蘇徐州復校，1948年再避內戰而遷至無錫。
 - 13 〈一個勝利的團結的盛會〉，《天風》，期330（1952年9月6日），頁2。
 - 14 〈介紹金陵協和神學院〉，《金陵協和神學誌》，期2（1954年4月），頁40至42。金陵協和神學院的四條「信仰的基石」是：「一．全部聖經為神的啟示，包括一切有關得救的要道，為信徒信仰的基礎和行為的準則。一．獨一神為萬物之本、人類之父，滿有公義慈愛。一．耶穌基督為神的聖子，為了救贖世人，道成肉身，被釘在十字架上，又從死裏復活，做教會的元首，萬世的救主。一．聖靈為三位一體中之一位，做重生和成聖的工作，在教會裏賜給信徒各樣的恩賜。」注意，四條各列為「一」，並無次序之別。
 - 15 金陵神學院三十多位老師中，三分一屬基要派背景，而百多位學生中，屬基要派傳統的亦有六成之多。韓彼得：〈金陵協和神學院介紹〉，《金陵協和神學誌》，創刊號（1953年9月），頁13。這種分班局面，一直維持至1958年止。
 - 16 此文並未發表。
 - 17 陳澤民（1917-），1941年畢業於滬江大學，1944年畢業於金陵協和神學院。1952年起在金陵協和神學院任教，1982至2002年間任副院長。
 - 徐如雷（1923-），金陵協和神學院「學習委員會」主席，後任《金陵協和神學誌》主編。文革後復校以來，兼任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所長，主編《宗教》。
 - 18 林聲本（1927-），抗戰期間入讀廣西梧州建道聖經學校，1947年到廣州，在東山堂事奉。後再入讀廣州兩廣浸會神學院，1950年畢業。後再入讀金陵協和神學院，1954年畢業。
 - 19 有關決議：「在反帝、愛國、愛教的共同目標下，促成基督教會所有信徒的大團結，進一步開展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對各教會在信仰上、制度上、儀節上所存在的差別，採取互相尊重的原則」。〈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四項決議〉，《天風》，期425至427（1954年9月3日），頁43。
 - 20 李晨鐘，畢業於湖南聖經學校，曾任安徽省宣城基督教會牧師。
 - 21 《聖光》的宗旨是「闡揚基督福音的真理；培養各地弟兄姊妹的靈命；供各地教牧工作人員查經、靈修、講台及教牧工作經驗等材料」。創刊號於1957年3月1日出版，作者包括賈玉銘、蔣佩芬、楊紹唐、孫漢書、韓彼得、蔡文浩、李晨鐘等。1958年2月10日出版第7期後停刊。但該期的「編者的語」並沒有表達停刊的想法，仍呼籲訂閱及投稿。
 - 22 匡亞明（1906-1996），中共黨員，1963年起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文革後復職。1982年任南京大學名譽校長。
 - 23 Justo L. González,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共三卷。翻譯者包括陳澤民、司徒桐、莫如喜、陸俊傑、趙紅軍及孫漢書等。《基督教思想史》於2002年由金陵協和神學院出版。
 - 24 《宗教》由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出版，丁光訓及徐如雷任主編，於1979年創刊。
 - 25 韓文藻（1923-2006），原就讀於之江大學，太平洋戰爭後，轉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於1945年畢業。後任南京基督教青年會學生部訓練幹事。1951至1966年任南京市基督教三自組織要職。1980年，在第三屆全國基督教會議被選為全國三自副秘書長及全國基協副總幹事。1997至2002年任全國基協會長。
 - 26 任繼愈（1916-2009），北大哲學系畢業，後加入中國共產黨。196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任所長。1978年中國無神論學會成立後，任理事長。
 - 27 趙樸初（1907-2000），佛教居士，以佛教代表出席1949年新政協會議。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任副會長兼秘書長。1980年起，任佛協會長及中國佛學院院長。又是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 28 即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於1980年成立，出版《當代宗教研究》內部刊物。
 - 29 《研究動態》由中國佛教協會綜合研究室主編的內部刊物，刊載不少涉及宗教理論及宗教政策落實問題的文章。
 - 30 1982年，長期從事統戰工作的李維漢提出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問題。1983年，羅竹風在上海社科院宗教所展開研究及調研，成果於1988年出版。見羅竹風編：《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本書指出，宗教在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社會，仍有客觀存在根源，不能一律以「鴉片」概括。宗教信徒可以為四化建設作出貢獻，宗教能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
 - 31 許鼎新（1926-2012），廈門大學畢業，1950年入讀燕京大學宗教學院，主修舊約。1953年起，在燕京協和神學院任教。1961年，燕京協和神學院併入南京金陵，許調至南

- 京。文革後，金陵復校，許是復校的首批教師。
- 32 〔美〕威廉·費萊著，朱波明、汪維藩譯述：〈宗教和蘇聯外交政策〉，《宗教》，期2（1980年4月），頁27至43。
- 33 第二次全國統戰理論會議於1988年在北京召開。參中共中央統戰部理論研究中心、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編：《第二次全國統戰理論論文選》（北京：華文出版社，1989）。〈近幾年宗教研究上若干突破〉，《宗教》，期15（1989年6月），頁1至8。
- 34 丁光訓：〈丁序〉，汪維藩：《中國神學及其文化淵源》（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1997），頁1至2。又〈為汪維藩同作品所寫的序言〉，《丁光訓文集》，頁290至291。
- 35 丁光訓：〈中國基督徒怎樣看待聖經〉，《金陵神學誌》復期13（1991年3月），頁1至7。後收入《丁光訓文集》，頁77至89。
- 36 《丁光訓文集》由南京譯林出版社於1998年9月出版。
- 37 田童心（1967-），金陵協和神學院教師。
- 38 1954年，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1980年後，中國基督教協會成立後，合稱「全國兩會」，總部設於上海。丁光訓於1980年當選為全國三自主席及基協會長後，因其同時身兼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院長，故在南京成立全國基督教兩會駐寧辦事處（簡稱「寧辦」）。第七屆全國基督教會議召開時，結束「寧辦」。
- 39 矯捷，畢業於金陵協和神學院。
- 40 王神蔭（1915-1997），先後畢業於齊魯大學及聖約翰大學。1955至58年任中華聖公會山東教區主教。
- 41 莫如喜（1929-），原任教於燕京協和神學院，1961年燕京併入金陵，乃轉至南京。復校後繼續任教。
- 42 楊慧林（1954-），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現任副校長及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長。
- 43 張賢勇（1959-），1982年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後入讀金陵協和神學院，1987年畢業後獲派赴美留學。1989年回國後於金陵任教，至1994年辭職。2004年任教中山大學哲學系，2012年任法國里昂孔子學院中方院長。
- 44 孔祥錦（1927-2005），曾就讀於杭州中國神學院。曾任江蘇省聖經學校校長。
- 45 沈以藩（1928-1994），1948年畢業於金陵大學哲學系後，入讀聖公會中央神學院。父親是中華聖公會沈子高主教。1954年受牧職，1955年任中華聖公會總議會常務會辦事處幹事。1981年，任上海國際禮拜堂主任牧師，並參與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工作。1986年任中國基督教協會副會長，1988年在上海被祝聖為主教。1991年，被選為中國基督教協會副會長兼總幹事。曾視為丁光訓主教的接班人。1994年8月因心臟病離世。
- 46 「呼喊派」是地方教會的派系，名字源自李常受提倡信徒必須「呼喊主名」的教導。
- 47 唐守臨（1906-1993）與任鍾祥（1918-1997）原是上海基督聚會處長老，五十年代參加了三自運動。
- 48 唐守臨、任鍾祥：〈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教材》增刊（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1983年4月），頁1至39。此文經增訂後，收入《為真道竭力爭辯》一書內，在1983年由上海市基督教教務委員會出版。
- 49 蔡文浩（1913-1993），先後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金陵神學院及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神學院。任職中華基督教會浙江大會。新中國成立後，先後任蘇州江浙教會聖經學院代理院長、中華基督教會浙江大會執行幹事、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副執行幹事。1980年起，任浙江省兩會主席及會長。
- 50 蔣佩芬（1914-1995），畢業於上海江灣中華神學院。1950年至1955年先後在南京黃泥崗、韓家巷聚會所任傳道。1956年起任教於金陵協和神學院。1979年金陵復校後任教。
- 51 1982年2月28日，二百多名呼喊派信徒衝擊義烏縣禮拜堂，最後兩名為首人士被公安拘捕。此事後，政府將呼喊派定為反革命分子。
- 52 位於中國甘肅省酒泉市，曾是勞改農場。從1957年至1969年間，近3000名「右派」分子被關押在此接受勞動改造。
- 53 指1959至1961年間，毛澤東推行大躍進運動，因政策失誤導致的大饑荒。官方將期間「非正常死亡」的近千萬人口，歸咎於大自然災害。一般相信，實際死亡人口遠高於官方數字，原因也是由於大躍進運動所致。
- 54 李亞丁，金陵協和神學院畢業後，獲派赴美留學。回國後於金陵任教，至1998年再赴美。2004年於美國富樂神學院獲哲學博士學位。
- 55 包佳源，畢業於金陵協和神學院，後任「寧辦」主任。「寧辦」結束後，調任中國基督教協會副總幹事及培訓部主任。
- 56 1988年3月，廣東省頒布有關宗教活動場所管理的行政規定，提出「登記」要求。參〈廣東省宗教活動場所行政管理規定〉，國家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规司編：《全國宗教行政法規規章匯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頁216至221。丁光訓曾公開批評有關規定，參〈丁光訓反對廣東宗教政策〉，《百姓》，期187（1989年3月），頁17。
- 57 梁福寰（1919-1996），任廣東協和神學院復校後第一任院長，廣東省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
- 58 黃廣堯（1915-），1938至1943年，就讀於廣東協和神學院。1945年到金陵神學院進修。1950年由循道公會華南教區按立為牧師。文革後，曾任廣東省基督教協會會長，及廣東協和神學院院長。
- 59 有關雙重登記制度，參邢福增：〈民間組織政策與中國基督教〉，《二十一世紀》，期114（2009年8月），頁26至37。
- 60 1988年底，全國兩會常委聯席會議在上海市田林賓館召開，就理順三自與教會關係問題作討論。1989年「六四」後，田林會議被人指斥為「反對黨的領導，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黑會。有關理順關係的問題，可參邢福增：《當代中國政教關係》（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年），頁82至99。
- 61 丁光訓：〈理順三自組織和教會的關係——在全國兩會常委聯席會議上的發言〉，《金陵神學誌》，期10（1989年6月）。參邢福增：《當代中國政教關係》，頁99至119。
- 62 《金陵協和神學誌》，復刊號（1984年9月）。自第4期起，易名《金陵神學誌》。
- 63 汪維藩：〈中國教會的某些神學變遷〉，《金陵協和神學誌》，復期2（1985年6月），頁7至9。
- 64 汪維藩：〈放下你的「鞭子」！〉，《金陵神學誌》，復期9（1988年11月），頁8至12。
- 65 汪維藩：〈愛她，我常流淚，念她，我常祈求〉，《金陵神學誌》，復期24至25（1995年12月），頁30至31、48。
- 66 《與神同在》作者勞倫斯（Lawrence of the Resurrection）。《靈花》由張伯懷翻譯，初版於1957年，中國基督教聯合書局出版。1995年，由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文字工作委員會出版。
- 67 《要道問答》首版於1982年出版。
- 68 「中國基督教神學教育叢書」由1987年成立的神學教育委員會推動，小組成員包括沈以藩、陳澤民及汪維藩。叢書第一本於1989年出版，至1994年共出版十四種。全由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發行科發行。

- 69 《羅馬新講義》初版於1925年，由南京靈光報社出版。原文為：「信徒固當對政府對社會，盡其當有之分。但勿忘今日政府的不良，社會的黑暗，處在這危險的世次中……」。見《羅馬新講義》，第二十七章「在於國家的本分」。今據香港晨星書屋，1982年三版，頁206。
- 70 沈德溶（1922-），原就讀於東吳大學，太平洋戰爭後，轉入上海聖約翰大學，1944年畢業後，參加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智育部任訓練幹事。1951年起任《天風》主編。自1952年9月起至1966年，先後擔任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副秘書長。1980年10月至2000年，任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第四、五、六屆副主席，兼第四、五屆秘書長。1992年1月起連續三屆擔任上海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
- 71 《效法基督》原由黃培永翻譯，1947年由重慶佈道雜誌社出版。1993年，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文字工作委員會再版。
- 72 顧約瑟，1987年畢業於浙江神學院，1990年畢業於金陵協和神學院。後任教於杭州浙江神學院，1992年按牧，兼思澄堂牧師。
- 73 有關金陵神學生在八九民運期間的情況，《橋》有詳細報導，見期36（1989年7至8月）。
- 74 1990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當代宗教研究室在北京召開「中國當代宗教現狀研討會」。
- 75 戴康生（1937-2003），中共黨員，1985至1998年間任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長，1993至98年間任所黨委書記。
- 76 當代宗教研究室於1992年成立。彭耀（1937-），主要從事當代宗教研究。
- 77 何光滄（1950-），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長期從事基督教研究。高師寧（1950-），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長期從事宗教社會學及當代基督教研究。張志剛（1956-），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現任北大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長。
- 78 李平晔（1949-），1981年獲武漢大學碩士學位，1988年以馬丁路德為題，獲博士學位。任職中共中央統戰部。
- 79 汪維藩：〈談基督教的現狀問題〉，《宗教》，期19（1991年1月），頁66至73。
- 80 《橋：中國教會動態》由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於1983年創辦，鄧肇明為主編，主要報導文革後中國教會的發展。1997年12月停刊。
- 81 張聲作（1932-），中共黨員，1988年12月至1993年3月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
- 82 葉小文（1950-），1991至95年任中央統戰部二局局長，主管基督教及天主教工作。1995年至2009年任國家宗教事務局（1998年3月前稱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
- 83 1991年12月，第五屆全國基督教會議在北京召開。
- 84 或譯「天父的兒女」。
- 85 江澤民：〈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莊嚴使命〉，《江澤民文選》，卷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151至166。
- 86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毛澤東選集》，卷2（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頁623至670。
- 87 汪維藩：〈試論鞏固和發展同宗教界的愛國統一戰線〉，《宗教》，期22（1992年2月），頁112至116。
- 88 沙廣義（1942-），1979年起於江蘇省宗教事務局基督教處任職。
- 89 1996年12月，第六屆全國基督教會議在北京召開。
- 90 羅冠宗（1920-2011），1943年復旦大學畢業，任上海青年會幹事。三自運動重要領導。1997至2002年間，任全國三自主席。
- 曹聖潔（1931-），1950年入讀聖公會中央神學院，52年神學院併入金陵協和神學院，1953年畢業，先後於上海聖彼得堂及懷恩堂任傳道。1959年調任吳耀宗秘書。文革後，在全國三自工作，並任基協副總幹事，又在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任副研究員。1988年按立為牧師。1992年任基協副會長，2002至2007年任全國基協會長。
- 91 孫錫培（1928-2011），就讀於中央神學院，1953年畢業於金陵協和神學院。後於杭州思澄堂事奉。1980年任思澄堂主任牧師。1994年任浙江神學院院長。
- 92 鄧福村（1929-），上海中央神學院畢業。曾任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副主席、浙江省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
- 93 蘇德慈（1933-），1953年復旦大學畢業。1985年9月起擔任華東神學院副教務長，教務長。1993年擔任華東神學院常務副院長兼教務長；1995年11月起擔任華東神學院院長。
- 94 韓文漢：〈同心協力建立基督的身體——按三自原則把教會辦得更好〉，《中國基督教第六屆全國會議專輯》（上海：基督教全國兩會，1997），頁1至25。
- 95 羅冠宗編：《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文選》，第2卷（1993-2006）（上海：基督教全國兩會，2007），頁111至113。文末按語「由韓文漢宣讀」。
- 96 1999年底，「中國基督教神學思想建設推進小組」成立，由丁光訓任組長，副組長是曹聖潔及韓文漢。
- 97 丁光訓在1998年發起「神學思想建設運動」後，汪持不同意見，認為此舉破壞了「互相尊重」的原則。參汪的文章：〈有關自傳研究的幾點思考——神學群眾運動之反思〉，《金陵神學誌》，1998；〈重澄「互相尊重」原則〉，《金陵神學誌》，1999；〈慎言「宗教改革」〉，《研究動態》，1999年1期；又《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3期；〈宗教觀念之變革：馬、恩如何說？〉，《研究動態》，1999年2期；〈講「適應」，要同中央一致〉（1999）；〈也談中國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適應論」〉，《研究動態》，2004年9期；〈再談「適應論」〉，《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通訊》，2005。以上各文全收入《十年踟躕》一書內。
- 98 1998年11月舉行的濟南會議上，全國兩會更正式通過決議，「決定加入神學思想建設工作的力度」，使神學思想「與社會主義社會更好地相適應」。同時，丁光訓提出「淡化因信稱義」的主張，亦引起較多爭議。有關主張與中國教會內部眾多具基要派及福音派背景的信徒間，形成了強烈的張力。儘管丁光訓多次重申信仰上互相尊重，神學思想建設「絕不是非基要派要去打擊基要派」，但教會內部事實上出現了要整頓基要派的恐懼。1999年間，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便發生了校方領導與部分學生及老師的衝突，有學生因而被勒令或自動退學，亦有老師被開除教席。不少基要傳統背景的同工及信徒憂慮神學思想建設就是「自由派」打壓「基要派」，淡化因信稱義即是淡化基本信仰。面對國內教會人士對神學思想建設的不同立場，丁光訓在《天風》撰文，不諱言中國教會「在神學思想建設的影響下也在分化」。
- 99 丁光訓：〈調整宗教觀念的召喚〉，《人民政協報》，1998年9月4日。又〈老的神學思想要有所更新〉，《人民政協報》，1999年3月5日。
- 100 參註96。